

空華集卷第十七

說

文仲說

大明國天寧長老仲猷闍公嘗爲番易一藝上人字曰文仲上人適自龜山而來謁空華子出紙索爲字說以訂其義然空華子默者之流於文非行家而屢嘗妄爲人所逼爲它文說者若干首今無復可說是時客有伯仲二氏以道德文章問答於座側者伯氏問諸仲氏曰一文一藝空中小柄此梁亡名子之言也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此唐杜甫子之言也如二子言則文章與乎道遠者明矣而雜華經則說善薩能於離文字法中出生文字又說雖隨世俗演說文字而恒不壞離文字法子劉子則說心之精微發而爲文如此二者說道固不外乎文字矣夫何儒釋二義前後相反如斯也邪仲氏答曰抑揚也非相反也今夫儒釋二氏之徒不務其本而競其末者滔滔皆是斯前之所以抑焉而又道之與文譬若一樹而有根柢枝葉之別皆由一氣所發焉夫道德文章是吾心之固有有于中者必形乎外故曰心華發明照十方刹斯後之所以揚焉吾曰是抑揚也非相反也於是伯氏釋然喜曰吾今日乃知祖師道非離文字非即文字如仲氏始可與言乎文而已二客既退遂取其問答者

鄭樑生著

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鄭樸生著

文史哲學集成

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 / 鄭樑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88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412)
ISBN 957-549-252-8(平裝)

1. (宋) 朱熹 - 學術思想 - 哲學 2. 哲學 - 日本

131.4

88017269

文史哲學集成 ④12

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

著 者：鄭 樑 生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四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549-252-8

序

如標題所示，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就是「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時間則侷限於日本的中世，亦即大約自鎌倉時代（一一八五—一三三三）至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之間；此一時期相當於中國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前後，至明神宗萬曆元年頃。

衆所周知，自從朱子學於南宋末年隨禪宗東傳日本以後，經赴日華僧蘭溪道隆、兀庵普寧、大休正念、無學祖元、一山一寧，及留學中國的日僧圓爾辨圓、南浦紹明等僧侶的傳布，便逐漸在彼邦興盛、發展起來。先後出現了虎關師鍊、夢巖祖應、義堂周信、絕海中津、中巖圓月、岐陽方秀、雲章一慶、仲芳圓伊、季弘大叔、桃源瑞仙、橫川景三等名衲；而他們的相關作品汗牛充棟。雖然如此，日本學者之從事此一學術領域之研究者並不多，此或許由於其文字艱澀難懂使然。在此情形之下，海峽兩岸三地的學者之涉及這方面的問題的，管見所及，除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王家驊教授在其《日中儒學的比較》（東京，六興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第三、四、五章，及筆者在近年所發表若干篇什外，可謂絕無僅有。

朱子學不僅曾經影響了南宋以後的中國學術界與思想界，也還給韓國與日本學術界、思想界造成重大影響。就日本言之，它既成爲彼邦中世儒學研究的主流，造成漢文學研究的另一個高峰，也給彼邦哲學思想界帶來重大影響，更成爲江時戶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文教政策的根據；而其影響，至今仍有脈絡可尋。朱子之學術思想既然對日本的影響如此重大，卻又只有少數人從事這個學術領域的研究，未嘗不是一件憾事。因此，遂不揣淺陋，根據現有所能掌握的資料，來探討此一方面的問題。

由於此一研究範圍牽涉到儒、釋兩教，這個課題對主修中、日關係史的筆者而言，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書中所言可能未必能深入切中，尙祈方家不吝指正。

一九九九年歲次己卯初秋日 鄭樸生 識於淡江大學歷史系

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

目次

序	一
第一章 序論	七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其架構	七
第二節 五山文學研究的概況	一八
第二章 朱子學東傳的緣起	二九
第一節 南宋以前的中國禪宗概觀	二九
第二節 王侯儒者之參禪	三四
第三節 禪與中國文學	四二
第四節 中國禪林的儒學觀	五一
第三章 朱子學之東傳與日本禪林	六七

第一節	中國禪林文學之東傳	六七
第二節	日本禪林的宋學觀	七五
第三節	日本禪林文學的發展	八二
第四節	宋學關係圖書之東傳	八八
第四章	東傳途徑與相關人物	一〇七
第一節	十二世紀以前的日本儒學	一〇七
第二節	朱子學的東傳途徑	一一三
第三節	撒播日本朱子學種籽的人物	一一九
第四節	在日本弘揚朱子學的人物	一二三
第五章	日本禪僧對朱子學的理解	一二七
第一節	對朱子學的認識	一三七
第二節	對《五經》的理解	一四六
第三節	對《大學》、《中庸》的理解	一五五
第四節	對《論語》、《孟子》的理解	一六四
第六章	朱子學之應用情形與傳布情形	一七九
第一節	對朱子學的應用	一七九

第二節	朱子學在地方上的發展·····	一八七
第三節	朱子學對當時公卿貴族的影響·····	一九五
第四節	江戸時代の朱子學·····	二〇四
第七章	結論·····	二一九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其架構

自從儒家經典之一的《論語》於晉武帝太康五年（應神天皇十五年，西元二八四）八月，由當時旅居百濟的漢高祖劉邦之後裔王仁（註一）東傳日本以後，中國經學在六世紀初已被日本作有系統的移植，從而彼邦人士閱讀漢籍之風氣日盛，研究儒家經典已成爲他們步入宦途的敲門磚。於是講授儒家經典者日多，以儒學自成一家之言者漸夥，以朝廷公卿爲中心的儒學研究曾造成日本文化的一個高峰。惟至後來，卻因武士執政，公卿沒落，所以儒學亦逐漸式微、僵化。並且自鎌倉時代（一一八五—一三三三）以後，復因其國內戰亂頻仍，人多尙武輕文。尙武輕文的風潮當然無法蘊育深刻的哲學思想。職是之故，自此以後至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一六〇三—一八六七）爲止的約四百年間，日本的儒學研究，除以五山禪僧爲中心的禪林文學一支獨秀外，其他文藝、學術則鮮有可觀者。

當五山文學興起時，宋代理學亦開始在日本傳播。經五山禪僧的耕耘，理學在德川時代不僅已發達成爲幕府作爲其文教政策之根本的「正學」，更成爲當時日本哲學思想之主流。非僅如此，此一思

想也曾給予其武士道重大的影響，而對其明治維新之尊王思想更起了極大作用。因此，本書擬探討理學東傳日本以後，在彼邦傳布與發展之情形，及對其文教政策、民族精神的幾個層面所造成之影響。

日本禪僧所遺留的著作甚多，目前對那些作品作系統而深入研究的，管見所及，除足利衍述的《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註二），蔭木英雄的《五山詩史の研究》（註三）及芳賀幸四郎的《中世禪林的學問および文學に關する研究》（註四）外，似可謂仍不多見。五山文學雖居於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性地位，對其作品卻大都只停留在某一層面之極小範圍的研究，這種現象誠使人感到遺憾。由於那些作品之與宋、元、明時代學術思想有關者甚多，如果能對其內容作廣泛、詳實而深入的考察，將對中、日兩國此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有莫大裨益，故擬以「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為題從事探討。當要探討之前，則擬有別於上舉足利衍述之以禪僧們個人之成就，與其作品特色和其對新儒學之見解作為探討之重點；蔭木英雄之專門以其詩篇為研究對象；或芳賀幸四郎之針對五山禪林的論著作一般性考察；而擬就其思想，尤其那些禪僧接受新儒學以後，對當時日本學術、思想界所造成之影響，及在那以後如何發展的問題，並且與東傳時的中國學術思想作一比較，藉以瞭解兩者之間到底已產生怎樣的差異。

區分日本中世文化與古代文化的最大標幟，就是古代文化主要受到六朝文化與唐文化之影響而發達，且對它具有親近性；中世文化則深受宋、元、明文化之影響。從事輸入宋、元、明文化者雖不侷限於禪僧社會，然無論在質或在量上，曾費最大氣力且最熱心從事移植宋儒新說者，卻是禪僧。所以

就這種意義上言，日本禪僧既是在其整個中世裏代表最進步的文化前驅，也是標幟著該國中世文化的特徵及形成具有極大貢獻者。

當時居住於五山、十剎及其他許多禪宗寺院的禪僧，他們不僅引進日本中世文化的新機運，而且成為開展此一時期文化的主要推動者。這種文化是從中國移植的，當移植之時，亦會有許多中國僧侶參與此事，貢獻他們的力量。因此，正確認識由禪僧們所形成的日本中世文化，尤其由他們所樹立的學術與漢文學，及它對當時日本所造成之影響，應可說是要把握中國學術東傳日本以後之發展情形，與夫瞭解日本中世文化，特別是學術與文學之歷史的實態之重要作業。並且爲要瞭解日本中世禪林的學術與其文學本身之價值，和對日本中世文化作歷史的把握，與瞭解其近世文化的根源，以及宋、元、明時代的新儒學究竟經由何種途徑被移植日本？被移植後究竟如何發展？更由於這種文化在日本儒學史、漢文學史上居於最重要時期，故此一主題之研究應可說是極其重要而且有意義。雖然如此，或許因其史料之特殊性與難解性，以致彼邦學者缺乏作廣泛而深入之研究之人。也因爲如此，海峽兩岸三地的學者也就很少有人注意及此，以致有被忽略已久之慨，遂導致至今仍未被開拓的一個領域。因此，本書乃欲對此一學術領域作深入探討，以明中國原有的這種文化被移植、發展以後，到底與中國原來的有甚麼不同？及中國文化東傳以後的薪傳情形。

爲達到這些目的，及站在當前學術水準上，來綜合把握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情況，本書乃從日本禪林之著作與夫彼邦朱子學與漢文學之發展過程中提出幾個重要論題，分爲下述七章，並將各

章分爲數節，來作系統的論述。

第一章爲〈緒論〉。在此，除說明撰寫本書之目的與其全文結構外，也敘述研究日本禪林文學與中世新儒學發展之沿革。

第二章爲〈朱子學東傳的緣起〉。中國禪道之興隆，雖在菩提達摩東渡之後；禪觀之實行則不自菩提達摩始。東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誦持禪經，備盡其妙。建和二年（一五〇），振錫來至洛陽，譯出《安般守意經》，爲習禪者所依，此爲東土禪教之權輿。後來，月支國沙門婁迦識，中天竺人曇摩迦羅等，先後至中國弘揚佛法。此後，名僧輩出，至兩宋時，禪宗已趨爛熟。當禪道爛熟之際，日本僧侶明庵榮西、希玄道元先後至中國習禪；前者成爲彼邦臨濟宗始祖，後者則成曹洞宗始祖。

當禪道大盛之唐宋、五代，王公大臣之皈依者不少，如宋太祖、太宗之帝王，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等學者，無不受其影響。士大夫們既受禪之影響，則其所作詩詞、文章之亦或多或少的會帶有禪之色彩，乃自然趨勢。

中國文人接受佛教的契機，是魏晉玄學的興起。魏末正始（二四〇—二四六）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而玄學就是儒學的老莊化。至於晉代，玄學形成了一代風氣，名士們競談虛無，並發現了玄學與佛教初傳時的大般若相似處。在此情形之下，玄學家以佛教來豐富自己，佛家則依附玄學發展自己的「般若」理論，從而使釋子與文人大大改變了漢魏時期相互隔離的局面。迄至東晉，士

大夫崇佛已相當普遍，而僧人之與名士交往者亦復不少。由於思想與生活情趣上的同調，遂導致文學上的同步。

禪宗雖然標榜「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但這並非表示它不使用文字，乃是說它不用所依之經典，不逐尚邏輯的系統，以直觀臻於悟入之境界。故它不以文字作為推演其邏輯之手段。因禪宗乃最中國化的佛教宗派，而中國又非常重視以文字來表達己意，所以社會的一般傾向便自然影響及於禪林。

當禪僧與士大夫階級有較多往來後，也將其文體應用於佛門，影響所及，終於成為禪林文學之一種世俗化。迄至南宋末，由於禪林文學過於世俗化，所以便有人對此一事實加以反省，故從元末開始展開所謂偈頌運動，沿用世俗人士所用詩文之體裁，題材則侷限於佛教教義，亦即以吐露禪僧在修行過程中所誘發之詩情為其宗旨。

禪宗雖在南宋時代由日僧明庵榮西東傳日域，其後復有華僧一山一寧、蘭溪道隆、無學祖元等名衲先後渡日弘揚禪旨，但對日本禪林文學有深厚影響的，大都是在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東渡者，亦即於佛教領域推動文藝活動之一派僧侶。職此之故，筆者將在此探討朱子學何以在當時東傳之緣由。

第三章〈朱子學之東傳與日本禪林〉。禪宗之所以東傳，乃由於日本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八五）末期，隨著宋日交通之逐漸頻繁，當時日本佛教界的部分人士已對其佛教感到停滯而無進步，故有不少僧侶先後到中國求新佛法。其到中國學佛者之將禪移植日本，固為鎌倉（一一八五—一三三三）初期之事，但禪宗東傳後不久，日益興盛，迄至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就成為日本佛教的

主流。

日本的禪宗是由於其僧侶來華學習，及由中國禪僧東渡彼邦傳布，雙向交流而形成的，而中國學術之東傳，則可能以後者的力量爲大。自一山一寧於元成宗大德三年（一二九九）持詔前往扶桑招諭不歸後，日本禪林便開展研究中國學術風氣之機運，而此一時期適爲中國禪林文學世俗化的時代，故其作風也被原原本本的東傳日本，並且發展起來。

「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固爲禪宗之法門，然中國禪林對《楞嚴經》、《楞伽經》、《金剛經》等內典的研究，從禪宗發達之初期即已開始，而強調「慧」方面的教相與禪宗接近、融合，這種傾向在唐末至五代之間已經很顯著。

當禪宗東傳日本的時期，中國方面的教與禪，禪與淨已經融合，故對教理、教相的關心隨著高昂，研究內典的風氣漸盛。而此種風氣，也隨禪宗之東傳而傳至扶桑，此可由首先將此宗傳至東瀛的明庵榮西之台、密兼修，八宗兼學，及在京都一帶奠定禪宗基礎的圓爾辨圓之八宗兼學事蹟獲得佐證。並且由圓爾於來華留學東歸時，將許多有關佛教的書籍帶回日本，便可知他教禪一致的立場，與他對內典用功之深厚。圓爾的這種態度，成爲他日後所建東福寺及建仁寺之傳統，而此種傳統又被採取禪教不分之態度的夢窗疎石一派僧侶所繼承，所以日本禪僧不但閱讀內典與外典，而且設法輸入其所需之各類典籍。

當禪林學習外典的風氣漸開之際，便有許多傑出的詩文僧侶相繼出現，使禪林文學到達最高潮。

惟他們的漢文學與前一時代不同，故排斥漢唐訓詁之學，接受宋儒性理之說，崇信朱子學，終於認為「不以朱子爲宗，非學也」。當時的日本禪林推崇朱子學的情形如此，就要有許多相關圖書來因應其需要，故元明時代東傳的此類圖書必然不在少數。惟因當時進口的文獻，不若明末清初之有清單可資查考，故只能從日本禪林之著作，及當時成立的文庫中去判斷，但筆者在此將從圓爾帶回的許多外典中，舉出與朱子學有關之著作，以瞭解當時輸入此一領域之圖書之一端。

第四章〈東傳途徑與方式及相關人物〉。在朱熹以前或與之同時，佛徒之學儒者甚多，如：天台宗之無外智圓，禪宗之了元佛印、佛日契嵩、闡提惟照、參寥道潛、德操如璧、冷齋惠洪、淵潭法英、大慧宗杲、癡庵祖覺、別峰宗印、滅翁文禮、蓬庵永聰、懶庵鼎需、簡堂行機等，即其著名者。其中以智圓、契嵩二僧爲巨擘。二僧中，又以契嵩對社會之影響最大。契嵩對儒學之造詣極深，他雖言學儒以爲禦侮之資，此只不過是表面上之藉口而已。因爲他非但批判排佛之先鋒韓愈，而且曾與歐陽修論難，更著《補教編》以倡導儒、佛兩教之一致。由此觀之，禪僧是爲便於弘揚已教而接近在士大夫間具有勢力的儒學，而此乃北宋以後之事，所以禪僧們之接近儒學之事實，對朱子學之成立亦有所貢獻，而朱子以後之禪僧之研究朱子學以謀調和，其主旨亦在於此。

朱子以後至宋末的禪僧中，研究朱子學的重要人物有滌山太初、退谷義雲、束山道源、北磬居簡、癡絕道冲、無準師範、自得惠暉、笑翁妙堪、偃溪廣聞、物初大觀、虛堂智愚、雪峰妙高、晦機元照等而以滌山、北磬、癡絕、雪峰爲著。這些禪師俱言朱子學之居敬窮理，窮理盡性，格致誠正，在禪

教亦皆有；謂：禪之頓悟即窮理，見性即盡性；復屢舉儒、佛兩教之一致處與相似處，以爲它們不相悖之佐證，從而倡言儒、佛一致以補其短，以便於弘揚己教。

由於理學與禪之教理靈犀相通，其作爲實修之居敬窮理與禪之打坐見性有一脈相通之處，故容易使禪僧理解而使其有親近感。因此，北澗居簡、癡絕道冲、無準師範等名衲無不言儒釋不二，而倡三教一致，持包容儒學之立場。而此一立場遂成爲宋代禪林之風潮。這種風潮在理學東傳日本以後不久，因受東渡華僧與來華學禪之日僧的影響，在日本也造成研究理學之風氣。

當時對日本理學之興隆有重大影響者有一山一寧、蘭溪道隆、無學祖元、無準師範、清拙正澄、了元佛印、佛日契嵩、闡提惟照、參寥道潛、大慧宗杲、別峰宗印、大休正念等人。他們不但對朱子學有相當之研究，而且也都能將其運用於弘揚禪教方面。

在上述情形之下，禪宗雖然標榜不立文字，欲以禪定三昧之行來一超直入如來地，卻也爲排除無學自是，狂禪自喜之缺點，乃取理學之長而注意學問研究，認爲「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得聖人心，即是本源自性」，而孜孜努力於朱子學之鑽研。因此，筆者對此一方面的問題也將深入探討。

第五章〈日本禪僧對朱子學的理解〉。如據日本學者的研究，宋代理學係由京都泉湧寺僧不可棄俊仍東傳扶桑。理學東傳日本以後，使此一學術趨於成長、茁壯者既非當時執漢學之牛耳的公卿社會之博士家的學者們，也不是不可棄俊仍的傳承者，乃是出身五山的禪僧們。

無論朱子學也好，禪也好，無不以明心性之本體爲主，故殊途同歸。朱子學在於學問研究與修養